

深刻认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逻辑理路

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徐艳玲

【摘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是客体逻辑和主体逻辑齐头并进、相互交织、良性互动的产物。一方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时代之问和实践客观需要的积极回应；另一方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理论创新主体诉求的积极回应。正是客体逻辑与主体逻辑的相互作用和相互统一，构成了一条比较清晰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形成的逻辑理路：在满足实践需要中实现理论自身革新，在理论自身革新中满足实践需要。这给予我们以深刻的启示：要在理论与实践互动中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形成的逻辑，要深刻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重大理论创新的思想方法，要在坚持问题导向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关键词】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逻辑理路 客体逻辑 主体逻辑 互动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8.13.004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紧密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和实践要求”而形成的，是“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1]的产物，这就初步揭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形成的逻辑理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是客体逻辑和主体逻辑齐头并进、相互交织、良性互动的结果。一方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时代之问和实践客观需要的积极回应；另一方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理论创新主体诉求的积极回应。正是客体逻辑与主体逻辑的相互作用和相互统一，构成了一条比较清晰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形成的逻辑理路：在满足实践需要中实现理论自身革新，在理论自身革新中满足实践需要。由此，应在客体逻辑与主体逻辑互动中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脉动。

徐艳玲，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科学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球化理论、现代化理论。主要著作有《从“被动全球化”到“主动全球化”——全球化视野中的中国社会主义历史演进》《全球化、反全球化思潮与社会主义》等。



客体逻辑：对时代之问和实践客观需要的积极回应

任何科学的思想理论的形成都不是空穴来风，都是因时而生、因时而变的。具体而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在具体的时空条件下对新世情、新国情、新党情的积极回应。这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形成的客体逻辑。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新世情的回应。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全球命运与共、休戚相关，和平力量的上升远远超过战争因素的增长，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更加强劲”^[2]。可见，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世界的主题，各国发展迎来新的机遇期，中国也身处其中。困难总是与机遇如影随形，我们所处的世界充满挑战和风险。国际金融危机泥潭尚未完全摆脱，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南北发展鸿沟愈加深重，地区冲突愈演愈烈，恐怖主义、难民危机、气候变化、信息安全等非传统威胁层出不穷，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新干涉主义日渐抬头。实现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中国不能缺席，需要中国智慧和方案。

在此新世情下，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要内容构成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基本方略之一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就成为中国智慧和方案方案的突出表征。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进行了相对系统、全面的阐述。这一理念立足历史时空，贯穿东西南北，彰显大国担当，在反全球化思潮兴起、逆全球化思潮汹涌的世情下，强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内涵的核

心是“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3]。这就从政治、安全、经济、文化、生态五个方面回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样的世界”这一关乎全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课题。可见，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有着广阔的全球视野，直面当今世界的重大现实问题，思考新时代中国之于世界的意义，深刻回答了全球化时代之问。这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形成的宏阔时代背景。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新国情的回应。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方位、开创性的成就，由此带来的变革也是深层次、根本性的。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中华民族正处于走向伟大复兴的关键节点，我国发展也处在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同时，正如十九大报告所深刻指明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一些突出问题尚未解决；民生领域还有不少短板；社会文明水平尚需提高；社会矛盾和问题交织叠加；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依然复杂；一些改革部署和重大政策措施需要进一步落实；党的建设方面还存在不少薄弱环节。^[4]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正是站在这样一个我国发展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新的历史方位上，面临新的矛盾问题，立足我国新的国情条件而形成的。十九大报告强调，“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5]。“新时代”的论断是对过往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努力奋斗的积极肯定，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到新高度的新判断，是对未来新的历史征程的整体把握。在这一“新时代”条件下，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6]，这是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同时，虽然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

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7]，这体现了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我国新的历史方位的判断和我国社会发展阶段特征的辩证认知。这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形成的逻辑起点。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新党情的回应。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将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严厉惩治政治腐败，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党内政治生活呈现新气象，党的执政基础和群众基础更加巩固，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政治保证。但同时，正如十九大报告所深刻指明的：我们党面临的执政环境是复杂的，影响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的因素也是复杂的。因而，“要深刻认识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深刻认识党面临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的尖锐性和严峻性。”^[8]正是这样的“新党情”，对党的建设提出了许多新的要求。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明确的问题导向，坚持打铁必须自身硬的使命担当和定力，以一系列有关党的建设的新思想、新论断、新举措，对新党情进行了积极的回应。如强调“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9]，把党的领导地位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强调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提出要“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10]的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强调将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提出“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决定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11]，将思想建设视为党的基础性建设，并将纪律建设纳入其中等。这些都体现了对“四大考验”的长期性、复杂性和“四大危险”的尖锐性、严峻性的积极回应。这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形成的重要的党情因素。

主体逻辑：对理论创新主体诉求的积极回应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不仅体现的是对客观实践需要的回应这一客体逻辑，又体现着其特有的主体逻辑。这种主体逻辑既源于实践的需要，又是理论内在自身发展的需要，是一种由内而发的自觉“扬弃”的需要。满足理论创新主体诉求需要诉诸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承与发展，诉诸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层次积淀，诉诸于对“他者”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镜鉴，以及理论创新主体自身的品质和素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诉诸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承与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继承与发展，具体表现为：既是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坚持，又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自然逻辑延伸。

一方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坚持。首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立足点和出发点，是致力于实现人民幸福。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实现人民幸福作为发展的目的和归宿。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明确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强调“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12]。其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贯穿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形成过程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先后以“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和“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为主题展



开过集体学习，力求把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作为共产党人的看家本领；面对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不忘初心，不忘初心也意味着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多次强调增强战略思维能力、历史思维能力、辩证思维能力、创新思维能力和底线思维能力等，实际上都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灵活运用。由此，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反映了马克思主义鲜明的政治立场，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

另一方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自然逻辑延伸。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许多内容要素都是在前人的基础上，根据新时代新实践新要求不断丰富和发展而成。例如，“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就是在“四位一体”的基础之上，根据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型的规律和生态环境的严峻形势，加入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容要素；“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对党长期以来强调的“建成小康社会”“改革开放”“依法治国”“从严治党”等思想的合理重构，使之成为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和顶层设计；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是在新时代条件下对“科学发展观”的延续和升华，是中国共产党人发展观的历史性新飞跃；“两个百年”奋斗目标以及十九大报告指出的“新两步”——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都是在改革开放之初提出的“三步走”战略目标基础之上，综合分析国际国内新形势和我国发展新条件之后所形成的新的战略安排。可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自然逻辑延伸，开辟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诉诸于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层次积淀。“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13]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14]。在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深情地说道：“站在九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吸吮着五千多年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拥有十三亿多中国人民聚合的磅礴之力，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无比广阔的时代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15] 这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自信有理由”的磅礴大气——正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淀和支撑，给予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强大的前进定力；正是有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淀和支撑，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文化自信才得以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四个自信”。

首先，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不少理念，在今天依旧具有启迪作用和精神价值。如“自强不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革故鼎新”等，一直都是激励中华民族筚路蓝缕、不懈奋斗的强大精神原动力。其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许多理念成为重要的理论渊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深深地扎根于其中。如“五位一体”中生态文明建设扎根于“道法自然”“天人合一”中，蕴含着遵循自然规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小康”一词就出自《礼记·礼运》，并赋予这个中国古代理想社会模式新的时代内涵，以描述当代中国的现代化目标；全面依法治国中“法治”与“德治”相结合体现了“礼法合治”；全面从严治党体现了“居安思危”；“五大发展理念”的“共享”理念体现了“以人为本”“民惟邦本”；“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平发展道路、互利共赢等倡议反映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尊重多元、和谐共荣的期许，体现了“和

而不同”“天下为公”“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协和万邦”等。

此外，习近平总书记还广泛引用中国传统文化经典来阐述自己的思想观点。比如，谈到提高党的领导水平时，引用“治大国若烹小鲜”（《道德经》）；谈到官员责任时，引用“如履薄冰，如临深渊”（《诗经·小雅》）；谈到依法治国时，引用“国皆有法，而无使法必行之法”（《商鞅·画策》）；谈到民生问题时，引用“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孟子·梁惠王下》）；谈到国家之间平等互待时，引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谈到战略思维时，引用“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孟子·尽心上》）；谈到真务实时，引用“不受虚言，不听浮术，不采华名，不兴伪事”（《申鉴·俗嫌》），等等。由此可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积淀了许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结合当下实际，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从而实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和现代化。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诉诸于对“他者”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镜鉴。理论的创新绝不是封闭的创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也诉诸于对“他者”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镜鉴。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改革开放的方向时强调：“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16]一方面，我们要积极地吸收借鉴外来的文明成果，不封闭不僵化；另一方面，面对西方思潮的涌入，要保持战略定力以避免苏联和东欧的悲剧重演。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诉诸于对“他者”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镜鉴表现在多层维度，如习总书记在谈到坚持全面深化改革时，强调要不断“吸收人类文明有益成果，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17]；谈到全面依法治国时，强调要“学习借鉴世界上优秀的法治文明成果”“以我为主、为我所用”^[18]；谈到党的建设目标时，强调要“努力建

设具有世界眼光的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19]；谈到对外交往时，强调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20]等。这些都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把“他者”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作为镜鉴的大气姿态。

同时，需要指出，习近平总书记还在多个外交场合“讲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时引用外国名言谚语，以拉近距离、消除隔阂、增加互信。如2014年3月28日，习近平在柏林的演讲中引用莱布尼茨的名言“唯有相互交流我们各自的才能，才能共同点燃我们的智慧之灯”^[21]，来说明国家之间交流与互鉴的重要性；2014年5月21日，习近平在上海亚信峰会上引用哈萨克斯坦谚语“吹灭别人的灯，会烧掉自己胡子”^[22]，来倡议通过对话合作促进各国交流和地区安全；2017年1月17日，习近平在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开幕式上引用英国文学家狄更斯的名句“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23]，来描述当今繁荣与冲突交织的矛盾世界；2017年7月7日，习近平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汉堡峰会上，引用德国谚语“一个人的努力是加法，一个团队的努力是乘法”^[24]，来倡导携手构建合作、联动增长、共同繁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目标。这些外国名言谚语的引用既增加了互信，也进一步丰富了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的蕴涵。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诉诸于习近平个人理想和阅历孕育出的卓越品质。“创意造言，皆不相师。”^[25]一种思想或理论的形成，与主要创立者的个人素质紧密相关。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复杂不稳定的外部环境和发生深刻变化的国内环境，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迎难而上，不断开辟治国理政新境界，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不能不诉诸于习近平个人理想和阅历孕育出的卓越品质。从陕西延川，到北京求学，到河北正定，到福建厦门、宁德、福州，到浙江，到上海，再到中央；



从西到东，从内陆到沿海，从欠发达地区到发达地区，从地方到中央；从县委，到市委，到省委，再到中央。这样的从政经历和丰富的人生阅历，为习近平个人思想和品质的完善提供了实践基础，深化了他对基层民众和中国社会的认识。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自己当年在河北省正定县的工作经历时说：“我当年到了正定，看到老百姓生活比较贫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比较落后的情形，心里很着急，的确有一股激情、一种志向，想尽快改变这种面貌。”^[26]正是这种青年时代就拥有的时代担当和一腔热情，加上丰富的从政经历，使其具备了卓越的品质。正是这种卓越的品质，使得在党的十八大以来新时代的实践中，习近平总书记才能够以非凡的理论勇气、高超的政治智慧、坚韧不拔的历史担当精神，把握时代大趋势，回答实践新要求，顺应人民新期待，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也正是在解决“难题”、办成“大事”的过程中提出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内容要素。

在客体逻辑与主体逻辑互动中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上述分析表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逻辑不仅基于客体逻辑，还依赖于主体逻辑，是二者良性互动的结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逻辑给予我们以深刻的启示。

首先，要在理论与实践互动中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形成的逻辑。马克思主义关于理论与实践的互动关系原理揭示：理论来源于实践，又反过来推动实践的发展。当实践发展到新的高度时，既有的理论会与新的实践不相适应，因此需要从实践入手对既有的理论进行调整，使之与新的实践相适应。正是基于实践中

的现实要求，也产生了创新主体对原有理论进行创新的强烈诉求，并直接推动了理论创新。

由此观之，实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形成的起点，同时也是这一重大理论创新的直接动力。具体而言，首先要去把握“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一方面，新时代下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另一方面，这个新时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表明一方面，以习近平总书记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是在毛泽东奠基、邓小平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框架之内不断地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概念能够准确、集中地反映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所做的所有事情的本质。可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重大理论创新，既是基于实践创新，也是理论创新主体基于实践创新中“变”与“不变”的时代特征，才最终得以概括、凝练和升华而成的。

理论创新往往不能在现实中一蹴而就。一方面，理论创新并不能在把握当代实践中找寻到全部答案，另一方面，理论创新需要面向未来，有着创新主体特定的主体诉求，这就是不仅需要创新理论，而且要充分发挥理论的指导作用，才能不断增强理论自信 and 战略定力，真正做到“咬定青山不放松，任尔东西南北风”。客体逻辑与主体逻辑二者并不是相互割裂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仅是在理论自身革新中满足实践需要，而且也是在满足实践需要中实现理论自身革新。由此，我们要在理论与实践互动中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脉动。

其次，要深刻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重大理论创新的思想方法。进而言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重大理论创新具有正确的思想方法。在2017年7月26日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了“时代是思想之母，

实践是理论之源”的重要命题，在十九大报告中又进一步强调了这一命题。这一命题其实为我们进行理论创新提供了正确的思想方法。理论创新从何而来？时代性和民族性（或本土化）是理论创新的两个重要维度。一个理论只有经历了新的时代条件的审视，符合了民族化或本土化的需求，才真正地具备了现实的价值，其理论创新才算真正实现了。换言之，当理论回到实践中接受实践的检验，其创新性诉求中必然需要包含时代性和民族性的元素。

笔者曾在《中国教育报》发表的《勇于推进理论创新》一文中指出：“长期以来，在对待理论创新问题上，也笼罩着一些认识迷雾，其突出的表现，就是教条式地对待马克思主义。教条式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因为未能从时代和实际出发，也就堵塞了理论创新之路。还有人把杜撰新名词和标新立异当作理论创新，有人把可能是适合西方国家的理论观点简单地照搬过来作为当作理论创新，有人简单地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观点不加以创造性转化直接搬用当作理论创新。”^[27]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形成和发展的逻辑，既不是简单地从马克思主义“本本”中来，也不是简单地从西方“输入”，更不是简单地从传统中“复古”，而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原则的前提下，站从时代性和民族性相结合的高度，深刻阐释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时代性课题，由此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和民族意蕴。因而，我们要坚持正确的方向和正确的思想方法，要在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前提下，以时代性为母进行孕育，以本土化为源进行深耕，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和中国化，并以理论创新的姿态，进一步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

最后，要在坚持问题导向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创新不是为创新而创新，而是为了立足并解决现实中的问题。因为只有立足并解决现实中的实际

问题，实践才得以向前发展，由此，理论创新的现实路径才得以打通，创新理论才有了基本根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问题导向这一马克思主义的鲜明品格，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行的道路上不断地推动理论和实践创新。面对“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前所未有，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的严峻问题，面对“思想观念的障碍和利益固化的藩篱”，洞悉形势，抓住机遇，应对挑战，革故鼎新，始终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坚定和自觉自信，以逢山开路、遇河架桥的精神，以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决心，敢于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不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了全新的境界，这给予我们以深刻的启示：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命力、理论的发展创新以及实践的拓进，归根结底取决于把握问题导向的认知水平和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

在当前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的背景下，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叠加式的、机遇和风险挑战是并存式的、群众期待是多元式的。坚持问题导向，是一种破解现实难题、推动时代进步的方法论，折射出的是共产党人的历史担当和责任意识。这就要求我们把坚持问题导向作为一种科学方法，把思考问题的视野放在当下现实所提出的最迫切的问题上。在某种意义上，“理论创新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28]。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哲学社会科学状况时也深刻指明：“社会总是在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总是层出不穷的，其中有一些可以凭老经验、用老办法来应对和解决，同时也有不少是老经验、老办法不能应对和解决的。如果不能及时研究、提出、运用新思想、新理念、新办法，理论就会苍白无力，哲学社会科学就会‘肌无力’”^[29]。要避免“肌无力”，就要坚持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在坚



持科学态度和正确思想方法的前提下,紧密追踪当今社会发展的新趋势,注重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等所带来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及时、有效地回应,特别是注重面向问题的实践创新机制的建构,从而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使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真理光芒熠熠地、持续地照亮华夏大地。

(本文系山东省社科规划研究重大项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转化、发展的研究”的阶段性生活成果,项目批准号:17AWTJ02)

注释

[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8页。

[2]习近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人民日报》,2017年1月20日。

[3]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58~59页。

[4]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9页。

[5]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0页。

[6]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

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1页。

[7]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2页。

[8]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61页。

[9]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0页。

[10][1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62页。

[12][13]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1页。

[14]习近平:《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人民日报》,2014年2月26日。

[15]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70页。

[16]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7页。

[17]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1页。

[18]习近平:《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

家》，《求是》，2015年第1期。

[19]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68页。

[20]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59页。

[21]习近平：《在德国科尔伯基金会的演讲》，《人民日报》，2014年3月30日。

[22]习近平：《积极树立亚洲安全观 共创安全合作新局面——在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四次峰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5月22日。

[23]习近平：《共担时代责任 共促全球发展——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

旨演讲》，《人民日报》，2017年1月18日。

[24]习近平：《坚持开放包容 推动联动增长——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汉堡峰会上关于世界经济形势的讲话》，《人民日报》，2017年7月8日。

[25]李翱：《李文公集·答朱载言书》，上海：商务印书馆，1919年。“创意造言，皆不相师”指的是文意辞句的创作贵在独创。

[26]霍小光：《真诚的交流 郑重的嘱托——习近平总书记与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速写》，《人民日报》，2015年1月13日。

[27]徐艳玲：《勇于推进理论创新》，《中国教育报》，2017年8月31日。

[28][29]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

责编 / 杨昀赞

Grasp the Logic of the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Xu Yanling

Abstract: The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the Xi Thought) is the product of the objective logic and the subjective logic going hand in hand, being intertwined and interacting with each other. On the one hand, the Xi Thought is a positive response to the question of the times and the objective needs of practice; on the other hand, it is a positive response to the demands of theoretical innovators. It is the interaction and unity of the objective logic and subjective logic that constitutes a relatively clear logical evolution path of the Xi Thought: realizing the innovation of theory itself while satisfying the needs of practice, and satisfying the needs of practice while innovating theory. This gives us a profound insight that we need to grasp the logic of the formation of the Xi Thought amid the interaction of theory and practice, profoundly grasp the ideological method of the Xi Thought as a major theoretical innovation, and further enrich and develop the Xi Thought in a problem-oriented manner.

Keywords: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logic, objective logic, subjective logic, interaction